责编 张 波 曲文亮 王立君 E-mail:tyrbszbb@126.com 太原日报

多元交融 匠心同辉

张 悦

北齐娄叡墓出土的彩绘陶马（资料图片）

太原的北齐壁画享誉海内外，是北朝艺术的巅峰遗存。经过千年，娄叡墓、徐显秀墓等处的壁画依然色泽如新，武士铠甲的寒光、丝袍的繁复纹样、酒具器皿的精巧，乃至颜料层中细腻的矿物颗粒，都在无声诉说着尘封的繁荣。这些穿越千年的遗存，印证着北齐冶铁技艺、陶瓷工艺和酿酒业的精进，尽显多民族交融下的匠心传承。

彼时的晋阳城（位于今太原晋源区）为东魏、北齐重镇，《北齐书》载其与齐郡并称“霸业所在，王命是基”，政治与经济价值达到顶峰。依托北齐政权倾力经营，晋阳城手工业蓬勃发展，形成官营为主、私营为辅的产业格局，成为支撑北齐霸业的重要支柱。经后世考证，当时晋阳手工业门类多元，涵盖冶铁、陶瓷、酿酒等领域，各行业技艺精进、成果丰硕，以精湛的水准，为这座战略重镇撑起“别都霸府”的物质基础。

铁器冶铸业

铁器冶铸业是北齐晋阳城手工业的核心支柱，其发展直接关乎北齐政权的农业生产、民生供给与军事保障，是支撑政权运转的关键产业之一。北齐政权对别都晋阳的铁器冶铸业极为重视，专门建立了规范化的管理机构与生产体系。据《隋书·百官志》记载：“北齐于太府寺下设诸冶东西道署（负责管理全国冶铁产业的专门机构）……诸冶西道，又别领晋阳冶、泉部……四局丞。”明确表明，北齐在晋阳城专设冶铁管理机构，对当地铁器冶铸业进行系统化、制度化管控。依托官营体系的强力支撑，晋阳铁器冶铸业迅速形成规模化生产格局，冶炼技术亦跻身同期北方先进水平，成为夯实北齐早期霸业的重要产业力量。

晋阳古城金属冶铸作坊遗址，考古发掘证明，遗址可追溯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（553）（资料图片）

彼时，北齐冶金家綦母怀文所创的灌钢法，也为晋阳铁器冶铸业注入了核心技术动能。据《北齐书》载，綦母怀文“以道术事高祖（高欢）”，率先发明并实践灌钢法，“烧生铁精以重柔铤，数宿则成钢”，还以此铸造出能穿透铠甲的“宿铁刀”，技艺堪称一绝。作为北齐军事重镇与铁冶中心，晋阳城也积极推广这种先进技术，推动本地铁器冶铸业迈向鼎盛。虽现存记载北齐晋阳铁器生产的史料较为匮乏，但隋唐及宋代太原铁镜、并州刀剪等铁冶产品享誉天下，足以印证北齐时期晋阳的铁器冶铸业，已为后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产业基础。

陶瓷业

此时期的晋阳，陶瓷业同样较为繁荣。晋阳陶瓷业依托独特区位与工艺积淀，形成兼具地域特色与多元内涵的格局。目前虽无北朝瓷窑遗存发现，但考古研究仍提供了有力佐证。

晋阳古城2021年发掘的瓷窑址主体为隋唐遗存，是山西已知最早瓷窑。其地层叠压关系与工艺脉络极具价值，根据出土窑具、瓷片的工艺特征，专家推断，北齐晋阳或周边应该存在成规模的陶瓷作坊。

娄叡墓、厍狄回洛墓和张肃俗墓等北齐高等级墓葬的发现，进一步印证，晋阳有着较为发达的陶瓷业。其工艺虽略逊北齐国都邺城，却独树一帜。

此时期陶瓷产品以彩陶为主体，生产规模、品类与工艺水平均有较高水准。晋阳彩陶产品涵盖实用器与明器等，器形丰富。实用器有鸡首壶、罐、瓶等，满足日常需求；明器以陶俑为核心，反映丧葬习俗与社会风貌。娄叡墓蟠柄鸡首青瓷壶、玉门沟黄釉双狮纹扁壶，均为同期精品，彰显高超技艺。工艺上，胎体厚重坚实，釉层晶莹温润，以青中泛黄为基调，施釉技术成熟；装饰技法多元，刻、印、贴、堆塑等相得益彰；纹饰以忍冬纹、莲花纹等为主，融合佛教与西域文化印记；造型兼具北方豪放与中原典雅，融汇多文化元素，印证了晋阳陶瓷业在北方的核心地位，以及北齐晋阳的文化包容性。

酿酒业

北齐时期，晋阳及周边汾州、西河一带酿酒技术日趋成熟，汾清、桑落等佳酿声名远播，跻身名酒之列，多次载入史籍，见证了酿酒业的兴盛。《北齐书》中明确记载，武成帝高湛驻跸晋阳时，曾亲手敕令其侄高孝瑜：“吾饮汾清两杯，劝汝于邺酌两杯。”寥寥数语，既彰显了汾清酒的绝佳口感，更印证了其作为皇室贡酒的尊贵地位。

战事场景亦折射出酿酒业的普及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，北齐军队坚守晋阳、大败北周军后，将士们“入坊饮酒，尽醉卧”，足见当时晋阳酒坊数量可观、酿酒规模颇大。

名酒佳酿的诞生，离不开优质酒曲与精湛工艺。学者考证，晋阳等地所酿美酒口感清冽甘醇，核心得益于“河东（今山西）神曲”的选用与考究工序。《齐民要术·造神曲并酒等》详述此曲制作：需以小麦为主料，搭配青蒿、桑叶、茱萸、苍耳、杏仁、豌豆等多种辅料，须在农历七月二十日前开工，原料配比严苛，“麦一石者，六斗炒，三斗蒸，一斗生，细磨之”，再按比例掺入辅料拌匀制成。

此外，晋阳作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，大量粟特人在此聚居活跃，不仅推动了本地葡萄种植业的发展，更带来了西域先进的葡萄酒酿造技术。

北齐晋阳手工业除冶铁、陶瓷、酿酒外，还有丝织业、食品业、金银器生产和乐器、颜料制作等行业，共同构成多元手工业格局，夯实了北齐霸业的物质基础，更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载体。铁器冶铸技艺、陶瓷烧造工艺和酿酒技艺等代代传承，奠定了隋唐乃至后世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基础，彰显了深远的历史价值。

北齐石葬具上的葡萄图像（资料图片）

晋阳手工业（4）

离乱不改初心

赵振国

听罢鹧鸪三两声，
出山何似在山清。
十年作宦同舆隶，
四海论交几弟兄。
乱后音书皆墨泪，
劫余骨肉倍恩情。
一鞭遥指汾河曲，
杨柳春围管子城。

——张瑞玑《太原途中书感八首兼寄晋阳诸友·之八》

张瑞玑，山西赵城（今洪洞县赵城镇）人，清末进士。忧国恤民、不畏强权的张瑞玑，在近代文坛影响颇大，其《谁园集》存诗六卷，380多首，多反映时事、忧国伤民、讥讽贪腐、抨击军阀，文笔犀利酣畅、气势磅礴，其中以山西地名为题的诗歌有20处左右。《太原途中书感八首兼寄晋阳诸友》为其中一组七律，前三首描述仕途失意，四、五首控诉遭罹国难的危机，六到八首抒发离别的忧伤，这首七律为第八首。该组诗将个人的仕途颠簸与动荡时局结合，融分别的悲伤与时事变革的无奈于一体，撩人心弦，慷慨悲壮。

1906年，张瑞玑任韩城县令，入仕宦生涯。从诗中“十年作宦”推断，此诗创作时间大约在1916年前后，此时诗人40多岁，“以与前民政长某君为道义交，去则同去，辞不受职”（《刘盥训日记》），辞任后“风尘一笑登车去，参破人间名利关”（《太原途中书感八首兼寄晋阳诸友》其一），离开太原回赵城老家闲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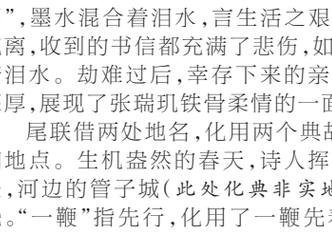
首联以鹧鸪的哀鸣起句，引出诗人对仕途的厌倦。首句入韵，鸟鸣对青山，以动衬静，辞官的心理刻画跃然纸上。鹧鸪，其声响亮而哀婉，入耳有悲戚之感，常在诗词中表达离别的愁苦。出山，喻出仕或任职；在山，喻在山中隐居。杜甫《佳人》有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”诗句。伴随鹧鸪鸟的哀鸣，在军阀割据的乱政中任职，哪里比得上归乡后的清静自在呢？

颔联以“十年”对“四海”，联中名词、动词两两相对，对仗工整，韵律和谐，流露出诗人对官场的厌倦，对朋友友谊的珍惜。“作宦”与“舆隶”对应，诗人感叹自己在官场沉浮了十年，如同车夫仆人一般卑微，做着辛苦而无足轻重的工作。“四海论交几弟兄”，反用《论语·颜渊》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”的典故，意为虽然广交天下朋友，但真正能称得上知己的人却寥寥无几。

颈联包含了时代和家庭等多层含意，面对动荡时局，人民流离失所，幸存者倍加珍视亲情。此联备述了人生的苦况，饱含悲情，自然真挚，催人泪目。“乱后”“劫余”指民国初年军阀争权，混战中原的时局。“墨泪”，墨水混合着泪水，言生活之艰辛。经历军阀战乱流离，收到的书信都充满了悲伤，如同书写的墨汁里含着泪水。劫难过后，幸存下来的亲人之间的情感更加深厚，展现了张瑞玑铁骨柔情的一面。

尾联借两处地名，化用两个典故，点出分别的季节和地点。生机盎然的春天，诗人挥鞭前行到汾河弯曲处，河边的管子城（此处化典非实地）四周绿杨垂柳环绕。“一鞭”指先行，化用了一鞭先着的典故，出自《晋书·刘琨传》：“晋刘琨少负志气，与祖逖为友，共以收复中原为志，曾与亲故书曰：‘吾枕戈待旦，志枭逆虏，常恐祖生先吾著鞭。’”一鞭遥指，通过动态描摹显现诗人先行奔赴前程的决心，暗喻作者对国家将来统一安定的坚定信念。“杨柳春围管子城”点明季节和环境，用拟人化手法表现春季杨柳环绕着汾河岸边的情态。管子城，此处当指管城子，为毛笔的昵称，典故出自唐韩愈《毛颖传》秦始皇将毛颖“封诸管城，号曰管城子”，这里借指自己无官无职的文人身份（或化用《后汉书公·孙瓒传》典故，言瓒追击乌桓，反被围辽西管子城，后坚守取胜封都亭侯的故事）。尾联一实一虚，以景结情，一扫前三联的离别哀伤，情致转为生机昂扬。作者虽然身处离乱之际，却对未来的国家命运和人生前途充满信心。

整体来看，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在经历了官场失意和时局动乱的洗礼之后，对过去的反思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。从国家的离乱到无官的清静，再到战乱后的友情与亲情的珍贵，最后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，构成了这首诗的情感脉络，塑造了忧国忧民的鲜活诗人形象。国学大师章太炎评价其“善诗书画，自谓书不如画，画不如诗，诗不如其为人”（《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》）。



扫码看视频

一方水土一方歌

武冠宇

在尧天舜日的古老时代，山西民歌就已经在人们的口耳之间传唱，《击壤歌》唱出了百姓的朴实与自足；《南风歌》仿佛带着温暖的南风，吹散了人们心中的烦恼。品种繁多的山西民歌，无论是山歌、号子，还是小调、套曲，都别具一格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山 歌

山西山歌因地而异，有“山曲”“开花调”“卷席片（也叫烂席片）”等名称。“山曲”主要分布在晋西北高原或吕梁山地区，其中以“河曲山曲”最为出色。“开花调”是流行在太行山区的一种山歌形式。主要分布于左权、和顺、武乡、襄垣各县，其中以“左权开花调”最为出色。“卷席片”是五台县、定襄县、忻县、原平县一带的叫法，其含意是信口即唱无所拘束，如陕北人称山歌为“信天游”、内蒙古叫“爬山调”一样。

号 子

山西号子主要有两大类：一类是夯硪号子，其中又分为“打夯号子”和“打硪号子”两种；另一类是黄河船工们唱的船工号子，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的河曲、河津、芮城等县。船工号子中又根据不同情况的劳动，分为“拨船号子”“行船号子”“拉篷号子”“爬山虎号子”“推船号子”等。

小 调

山西小调体裁形式丰富多彩，有优美的抒情歌，如《绣荷包》《茉莉花》《十样景》等；有轻松愉快表现日常家庭生活的俚俗小曲，如《卢狗亲上寿》《永不能生娘家》《姑嫂挑菜》等；有咏人述事的叙事歌，如《下柳林》《秋香哭婆婆》《苦伶仃》等；有热烈欢快适于节日或喜庆场合演唱的娱乐性歌曲，如《拜大年》《观灯》《闹元宵》等；有幽默、风趣的诙谐歌，如《热菜汤》《高高山上一骨嘟蒜》《大红公鸡毛腿腿》等；有贬斥谗懒等陋习的讽刺歌，如《花儿开》《抓跳蚤》《不相配》等。小调以二句式（如《交城山》）、四句式（如临县《绣荷包》）乐段结构为其基本形式，体现着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的规律。

套 曲

在山西民歌中，还有一些叙事性很强、形式较大的民间声乐套曲。这些套曲的曲调，大部分以明清俗曲或当地小调为基础，内容多为歌唱历史人物或历史传说故事，比较突出的有：左权的“大腔”、兴县的“昆曲”、柳林的“ 弹唱”。

由于全省各地地理环境、经济状况、文化传统（尤其是音乐传统）、语言，以及风俗习惯不同，各地民歌在音阶调式、调式骨干音和旋律特征等方面呈现着各自的风格色彩。

晋东南壶关、晋城、阳城、沁水一带的民歌，调式古朴；晋北河曲、保德、偏关等地的民歌，高亢辽阔，有塞上高原特有的雄浑憨直；晋南的民歌感情热烈；晋中祁县、太谷、寿阳、太原地区的民歌，则灵活自由、富于变化。

丁悠儿

郝妙海

丁（击打）悠儿，是上世纪50年代，在太原晋源地区颇受男孩子们青睐的一种游戏。

先介绍一下如何自制悠儿。悠儿的首要条件是结实。其次，在游戏中，悠儿要反复抛掷，故需厚薄、大小适中，既能立得稳当，抛扔时还能得心应手。要满足上述条件，石片当是首选。然而，满足条件的石片并不易寻，孩子们多退而求其次用相对易得的破瓮片来玩。瓮底最好，厚薄较为均匀。若用瓮帮，则最好找大瓮上端，弧度相对小一些。选到合适的料后，用锤子小心打凿成直径3寸多的椭圆片，并将边缘尽量打磨光滑，就可用来玩了。想当年，若能得到一块得心应手的悠儿，男孩子们都会宝贝似的保存着。

丁悠儿一般由两个孩子来玩。先在一块宽阔的平地上，划出两条相距约一丈五尺的线。双方站在一条线后，向另一条线抛出自己的悠儿，以悠儿落地后距线的远近决定玩耍顺序。然后，后玩的一方将自己的悠儿立在对面的线上，先玩的一方则站在线后，用自己的悠儿击打对方的悠儿。

第一次，扔出去直接击打即可。第二次，将悠儿扔到对方悠儿近侧，但不许碰到，然后单腿跳至自己的悠儿前，用脚后跟磕出自己的悠儿去击倒对方的悠儿。第三次，头顶自己的悠儿，仍单腿跳至对方悠儿前，然后身体前倾，悠儿从头顶跌下击倒对方悠儿。第四次与第三次相仿，唯身体要后仰，使悠儿从身后跌下。第五次则是站在线后，将悠儿放到右脚脚面上，然后用脚抛出去击倒对方悠儿。各次击打都有名堂，分别叫“一砸干”“二后磕”“前闷楼”“后闷楼”和“赤脚连”。在击打过程中如有一次失误，没能击倒对方悠儿，则互换位置，从头再来。

当参与游戏的孩子不止两个时，则失败者下场，另换一个孩子上场，此前被丁悠儿的孩子成为第二轮的抛悠儿者。

在孩子们的发挥和不同地域交流下，丁悠儿的玩法也并非一成不变。比如，站在线后，将悠儿从抬起的右腿下抛出；再比如，背对立着的悠儿站在线后，双腿叉开，然后弯腰将悠儿从跨下抛出；还有，右手握拳，拳眼朝上，将自己的悠儿置于拳上，举拳前行，至对方悠儿处将其抛下，等等。游戏中，无论采用哪种方法，只要悠儿中途落地，即算输。

在中国传统的古老游戏中，有一种叫“打瓦”的游戏，似乎与丁悠儿有点相似。《中国风俗词典》中，即有“打瓦”条目：在“广场地上划定相距十余米两条线。一条线后立破砖或瓦，数量与参与人数相等。群儿各持一小片石，由此线扔向另一线，以片石距线近远为先后，再由此扔回立瓦处，以击倒砖瓦者为胜。”从上述介绍来看，丁悠儿比打瓦内容更丰富，玩起来也更有趣一些，但其传承和演变的痕迹十分明显。单从字面上看，“打瓦”似乎更直观，也更好理解一些，而“丁悠儿”，只是在我的家乡不知传承了多少年、多少辈，而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。至于写出来究竟是哪三个字，就见仁见智了。我就曾在一些文章中见过“丁油儿”“顶悠儿”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。不过，玩过丁悠儿的孩子们，只要一见这三个字，就会立马回忆起这个有趣的游戏。

烟火深处 烽火留痕

刘晶鑫

太原的军事脉络，并未随着冷兵器时代落幕而消散。从营盘要塞到碉堡群，从军营重地到市井城区，这座城市的军事基因，以另一种方式融入街巷肌理，见证着从军事重镇到现代化都市的时代转型。

“营盘”类地名，是太原从古代戍边走向近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。老军营、大营盘、二营盘、三营盘、黄陵营、小店营……这些带着鲜明军事色彩的地名，从昔日壁垒森严的驻军之地，逐渐演变为车水马龙的城市街区，书写着“军魂入烟火”的独特变迁。

老军营的历史可追溯至宋金时期，明初正式筑堡驻军，是太原城南最早的规模化军营之一。明清两代持续修缮扩建，守护府城南疆。清末民初军营功能弱化，百姓陆续聚居，近现代随城市扩张成为成熟社区。如今的老军营街巷纵横、烟火鼎盛，早已不见军营森严，却以地名留存着千年戍边记忆。

大营盘的来历，与民国初年阎军在此修建大型兵营有关。随后修建的二营盘、三营盘互为掎角，构成城南防御屏障。民间“先有大营盘，后有南内环”的说法，正是其历史地位的生动印证。抗战期间，二营盘、三营盘被日寇扩建为侵略据点；解放后转为人民解放军军营，大营盘更曾入驻海军通信学校，成为新中国海军电子工程人才摇篮。1989年学校南迁后，大营盘转型为文教高地，三营盘西街更名为长风街，成为如今太原城市主干道。

黄陵营、小店营始于明代军屯，兼具练兵、囤粮、转运功能，清代后逐渐演变为集镇与城区。如今的黄陵、小店片区繁华热闹，军屯痕迹融入市井生活，成为太原南部发展的鲜活见证。

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，以“固守太原、屏障山西”为目标，在全城周边修建碉堡达5000余座，形成“堡中堡、塞中塞”的立体防御格局，被吹嘘为“固若金汤”。这些碉堡多为砖石或钢筋混凝土浇筑，独立碉、梅花碉、字母碉、明碉、暗碉形态各异，遍布山地、街巷、公园与关隘周边。其中以东山地势最险、工事最坚，牛驼寨、小窑头、淖马、山头四大集团阵地，绵延8公里，仅东山就有2400余座碉堡，是太原战役的核心战场。

牛驼寨四号庙碉是阎军防御体系的标志性工事，墙体厚达1.5米，射击孔密布，可俯瞰全城。1948年10月，太原战役打响，解放军战士不畏牺牲，以血肉之躯与千斤炸药攻破这一“钢铁防线”，为太原解放创造了必要且有利的条件。无数英烈用生命换来城市新生，让冰冷碉堡成为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的红色载体。

如今，太原仍保留数百座碉堡遗存，牛驼寨碉堡群已列为红色教育基地。它们与大营盘、老军营等地名一道，构成太原近代军事史的完整脉络，提醒后人铭记峥嵘岁月，珍惜和平生活。

那些曾经戒备森严的营盘、铁血峥嵘的碉堡，如今早已化作烟火人间与红色记忆，与宜居宜业、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生活密不可分。这些镌刻在街巷与遗存中的记忆，见证着太原的百年变迁，更传承着坚韧不屈、奋勇向前的城市精神，在汾水之畔，生生不息。